

##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首届温州财富高峰论坛上呼吁——

# 发达国家在回归实业 我们也要把实业做好

□本报记者 李尖 林迎颖

“中国经济不会老这样,中国经济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有着中南海经济“智囊”之称的樊纲在首届温州财富高峰论坛上看好温州,“温州已经从此前的金融波动中走出来,随着全国经济向好,下一轮将稳定发展,好的企业会进入低成本扩张期,利用好兼并重组的方式,利用好产能调整的过程,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抓住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7月30日,由温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温州日报报业集团、诺亚财富共同主办,由温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的“首届温州财富高峰论坛”吸引了一千余投资者和企业家齐聚温州。峰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达了上述观点。

樊纲说,过去十二年内两次经济过热,后遗症就是产能过剩,需要一段时间消除。中国的特点是软着陆,好处是稳定,坏处是时间长。中国经济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他分析实业与金融的关联,“金融是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服务,天下没有净收益永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产业。当金融业落后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发展金融才成为关键一环。搞金融的人别想挣大钱,只有实业能挣大钱。现在发达国家都在回归实业,所以我们要把实业做好。”

“要正视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樊纲在会上给出的积极信号。他指出,我们只不过是处于周期低谷,低迷时期也有其积极的作用。“比如说优胜劣汰,在经济过热时是不会发生作用的,但到了低迷时期劣质的企业就活不下去了。”樊纲表示通过这样的周期会产生兼并重组和整合,企业的专业集中度会更高。

对于人民币贬值,樊纲也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现在人们说的人民币贬值,指的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其实这几年人民币对各种货币一直在走强。“如果是有的货币贬值了,拉着你对美元贬值了,那只是你对美元贬值了,对其他货币没有发生变化。”他透露,就目前来看,近期人民币还要对美元适当贬值,这是因为其他货币对美元贬值,拉着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诺亚财富创始投资人、执行董事、首席市场官章嘉玉表示,温州人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可能有时候“吃螃蟹”的方式不对,会被“钳到”。早在2007年,有着丰富资本经验和敏锐商业嗅觉的温州人早就看到了价

值投资和可持续投资的重要性,温州就成为第一批试水股权投资的城市,诞生了长三角地区首个人民币PE基金。但经历过高潮的短短几年后,温州的PE行业就从高峰跌入谷底,落差之大,国内罕见。经历过信誉风险和金融风波,如今的温州在追逐利益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会关注风险,抵制诱惑。

峰会上,与会嘉宾分别从早期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当前火热的文化产业投资以及海外市场投资等各个角度,全面剖析了什么才是资深投资人眼中真正的好公司,也深刻说明了不同行业中好公司的标准其实具有共性——那就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为参会中小企业家带来了最前沿的金融动向。



樊纲

首届温州财富高峰论坛现场。



诺亚财富提供照片

### >>>对话中南海经济“智囊”

记者:温州金改已实施4年多,您有哪些建议?

樊纲:温州的金融发展一直比较开放,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所以很多问题较早爆发出来,这些问题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也在经历。还是那句话,金融是有风险的,需要制度和监管。温州金改中出来的成果有其特殊性,也存在共性。发展区域金融,一要找到恰当定位,二要靠制度建设。

记者:您说要尽可能少搞政府金融,使市场的力量和民间力量发展起来?

樊纲: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企业被淘汰,一部分企业兼并重组都是正常现象。政府尽可能少去配置资源,而用市场的方法发展市场,由当事人承担风险。比如,由行业龙头企业、当事企业、银行等协调,通过兼并重组和银行债转股等方式,提高企业集中度,清除掉过剩的、技术落后的、环境污染的企业,今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 ■思享金改

## 温州金融风波的理性反思

□张震宇

2011年下半年开始在温州出现的企业金融风波,表面上看是由商业银行盲目授信,中小企业盲目贷款、不理性投资造成的。实质上是银行僵化的、不切实际的“信贷文化”造成的,是中小企业“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不规范造成的。

温州市委、市政府借国务院决定在温州实施金融综合改革之便利,创新出台了一系列企业金融风险处置政策和措施。比如“一行一企一策”化解苍南仪表集团担保链风险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温州市风险处置机制的灵活性和科学性。为防止优质企业被拖死,坚持“先清偿后代偿、先抵押后保证”两项原则,推动“还款计划与期限、担保责任与比例”两个协商,合理分担代偿压力化解担保链风险。中城建设集团的破产重整案件的亮点在于探索性地提出“分离式处置,清算式重整”的思路,剥离“有毒”的不良资产债务,保护中城建设集团特等资质,实现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提高债权人的清偿率。浙江克莱顿科技有限公司帮扶案例充分体现了基层政府善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深得银行、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从法理上讲,担保责任是不能割断的。但是,当环环相扣的担保圈出现集中违约时,银行不良贷款大幅飙升,如果政府不及时出手,就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温州市政府确定了“企业担一点、银行让一点、政府帮一点、司法快一点”的处置思路和工作方法,努力在保企业和保银行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分类处置,将风险企业划分为保护、帮扶、破产重整、逃废债等4种,分别予以扶持、协调、处置与打击,专设机构牵头协调,风险企业处置完成率达98%。通过建立政府增信机制,设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应急转贷资金和出资补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引导银行增加贷款投放。通过对风险企业实施土地和产权分割出让,采取“退二进三”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让破产企业有序可破、担保企业有资可担。通过企业破产简易程序试点,使一般破产案件6个月内审结,无产可破案件3个月内可审结。四年多来,温州共协调帮扶企业1300多家,相关受益企业约4500家,剥离不良贷款近1400亿元,法院审结企业破产案件568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连续两年半实现“双降”。

2011年出现的这场企业金融风波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一要坚持主业,理性投资。过度融资、过度投资导致过度负债将难以有效控制风险;跨行业投资、偏离主业导致难以有效识别风险;杠杆率过高、投机过度导致资金链断裂。二是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接资本市场,拓展多渠道融资,有实力的企业通过IPO上市。三要合理配置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从银行服务的角度看:盲目看中抵押物,不可能降低贷款风险。银行要敢于发放信用贷款,才是长远之策。内部考核机制不改变,商业银行不可能有效服务中小企业。多层次金融服务机构不发展,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只有发展多种类的金融服务机构,才有可能解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从政府引导的角度看:“有形之手”适度引导是需要的。银企协调需要政府,打击逃废债需要政府,为企业担保增信需要政府。同时,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政府对地方金融适当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当前,温州处置企业金融风险向好态势基本明晰,但诸如彻底解套担保圈风险的处置措施,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特别是拓宽市场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改进银行内部考核贷款问责机制,推进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问题,更需要顶层设计。长远看还应适时修订《担保法》、《破产法》,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和财产核查制度等。

(作者系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温州市金融办主任)

## 北大发布首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浙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全国第三 杭州在全国337座城市中排第一

本报讯 近日,首份披露城乡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发布,在337座城市排名中,杭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城市排行上名列第一。而在省一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榜单上,上海、北京、浙江位列前三。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综合测量了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31个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及1754个县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根据指数的测算结果,在省一级的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榜单上,上海、北京、浙江位列前三。在337座城市排名中杭州排名第一,使用深度榜单、支付、征信、投资、保险等细分指标里均位于第一,覆盖广度榜方面位于上海之后排名第二,信贷方面则仅次于金华。这些数据表明,杭州乃至浙江的互联网金融在践行普惠金融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普惠金融降低了客户准入门槛,使得金融服务的平民化趋势日益凸显,通常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得到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

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地区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如2011年最高的上海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4.9倍,而这一差异,到2013年缩小到1.9倍,到2015年,这一数字更是缩小到1.5倍。

“过去的普惠金融讨论和指标往往局限于传统金融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性,但缺乏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角度来科学、全面反映我国现阶段普惠金融实践的统计指标体。”在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谈到为何要编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这样表示。莫利萍

### 杭州市科委 杭州10家银行 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联合推出

# 高新企业 信用贷款

联系电话:  
0571-87020963, 81396317  
13777404242, 18658868796



详情手机扫描二维码

科技金融新举措  
为杭州地区的国家级  
高新企业发放纯信用贷款